

从“奇迹时刻”看美国人工智能教育政策走向

9月4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召开了“白宫人工智能教育特别工作组会议”。这场由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科技巨头参与、教育界代表列席的会议,被称为美国人工智能(AI)教育战略全面落地的关键节点。会上,梅拉尼娅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机器人时代已经到来”,并强调“我们有责任让美国的孩子们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由AI主导的数十年时光。

梅拉尼娅在开场致辞中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奇迹时刻。”这句话被媒体迅速放大,广为人知,但会议背后所揭示的是一场关于AI、教育、监管与国家竞争力的多层博弈。

从行政令到国家动员: AI教育全面启航

这次会议有一个前期的背景。今年4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重要的行政令——《推动美国青少年AI教育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旨在通过系统性部署,将AI纳入从K-12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全面提升美国青少年的AI素养。

该行政令设立了三个核心目标——成立“白宫AI教育特别工作组”,协调教育部、劳工部、国防部等多个联邦部门;推动AI课程开发与全国师资培训;启动“总统AI挑战赛”,鼓励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用AI工具解决现实问题。

应该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场白宫会议被视为将政策“从蓝图变为施工图”的重要一步。作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娅亲自担纲协调人,也令会议更具象征意义和公众关注度。

梅拉尼娅的讲话风格延续了她在“成为最好”计划中所倡导的母性伦理与青少年保护理念。

所谓“成为最好”,是梅拉尼娅在其丈夫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推出的一项以青少年成长和数字时代挑战为主题的倡议计划。它是梅拉尼娅在其丈夫白宫任期内的标志性公共项目,旨在提升儿童的福祉,并引导他们在数字化世界中健康成长,特别是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做最好的自己”。

到2025年,梅拉尼娅重提“成为最好”的精神,再次提出对AI在教育、青少年成长中的伦理引导。这成为她推动“白宫人工智能教育特别工作组会议”的重要价值立场支撑。

梅拉尼娅在会议讲话中表示,“我预见AI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增长最快的领域。如果它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引擎,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负责任的教育基础上,就像我们培养自己的孩子那样。”

这种将AI比作“孩子”的修辞,在价值层面为AI设定了“成长需监管”的伦理边界。

硅谷走进教室: AI公司在下一盘怎样的棋?

这次会议的一大看点,是美国几乎所有



此次白宫会议打开的是一条通往未来教育的新通道,也开启了一场关于人、技术与教育治理的新辩论。这不仅关乎美国的下一代,也深刻影响全球AI时代的教育想象与制度构建。

主要AI科技公司领袖们齐聚一堂。他们不仅到场,更带着实打实的政策配套资源和产品承诺为AI教育站台,也为未来教育市场布局。

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表示,谷歌正构想一个美好未来——让每位学生“都能学习世界上的任何知识”。他透露谷歌正积极建立系统,使全美学校更便捷地获取AI资源。

IBM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宣布,IBM承诺为美国200万劳动者提供AI技能培训。同样出席会议的Code.org总裁卡梅伦·威尔逊表示,该公司将推动“2500万学习者接触人工智能”,目标是“变革教育体系,让学生在AI领域蓬勃发展”。

美国白宫表示,已收到135家企业支持美国AI教育的承诺,其中包括微软、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微软近日宣布将为学校提供免费AI培训并扩大其AI工具的访问权限,亚马逊则表示将协助教育工作者运用AI技术。

微软表示,Azure平台联动学校,打通AI教育“云端路径”。微软代表宣布,将利用其Azure平台为500所高中提供AI实验室,包括代码教学工具、AI写作训练系统、语音识别语言课程等模块。微软还与美国教育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支持开发“AI教师助手”,使教师能更高效地制定个性化课程,标注学生行为轨迹,甚至预测学生心理状态。

可以看到,这些科技公司正在构建的是一个多层次、跨平台、跨终端的AI教育生态,从教学工具、教学平台、基础设施到教师培训全覆盖。

然而,技术不是没有代价的。教育界的疑问也接踵而至:教师是否会AI课堂中“被边缘化”?AI是否将扩大城乡、贫富之间的教育技术鸿沟?学生的数据如何收集?模型是否会通过算法灌输某种思维方式?

社会各界对AI教育的多元回应

这场会议虽然形式上是一次政策部署会,但实质上是一个“公共话语制造场”。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应可以说多元而复杂。

一方面,在支持者看来,这场由白宫主

导、企业参与的AI教育部署是一次“时不我待”的国家战略行动。他们认为,面对全球AI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必须从青少年教育阶段就着手布局,将AI素养视为继阅读、写作、算术之后的“第四种基础能力”。科技企业如谷歌和微软则强调,公私协作是推动AI教育快速落地的关键机制,企业具备提供模型、平台与培训资源的能力,政府则统筹政策与公平分配。教育改革倡导者指出,AI并非威胁,而是学生通向未来的工具;若不在当下推动,下一代美国青年将在全球竞争中落伍。另一方面,担忧者的忧虑也不无道理,AI是否会成为“教育市场化”的加速器?他们认为,尽管政府与科技公司将AI教育描绘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但当前的推进方式过于仓促,缺乏对教育公平、隐私保护与技术伦理的深入讨论。

在他们看来,将大模型、大平台大规模引入中小学,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平等,进一步使得农村与低收入社区边缘化,也可能削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更令人担忧的是,科技巨头在“教育公益”的名义下快速占领校园生态,却未建立起足够的监管机制与透明标准。

政策走向的五大趋势: 从技术动员到文化战略

在我看来,从此次会议所释放的信息中,可以较清晰地梳理出美国未来在AI教育方面的五大政策趋势:

第一,AI从K-12全面推广至高等教育系统。目前AI的政策重心主要集中在K-12阶段,但总统行政令明确指出,美国政策涵盖从中小学到“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完整推广体系。换句话说,AI教育将向大学扩展,从而形成完整的学习路径。

第二,设立“AI教师赋能计划”,将教师重新置于AI教育核心。总统行政令明确要求“优先将联邦教师培训资助计划用于AI相关教育”,包括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以及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推进对AI教学实践的研究。

本战略,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化和效率至上的思维,其基本表现形式就是高等教育评价的绩效主义倾向。

绩效主义强化结果导向,缺乏对办学过程的重视。因此,高校评价往往更重视终结性评价、短期性评价,而发展性评价、长周期性评价不足。为了达到更高的绩效目标,高校将绩效分解为有限的、静态的和彼此孤立的指标,致使生态性的办学过程被肢解为碎片化的、意义贫瘠的办学行为。

在指标化办学模式下,量化评价由于更便于指标的测量与比较,具有更直观的效率驱动价值,从而被愈加强化。但量化评价在进一步分解办学体系的同时,其内在的数量比较机制又进一步强化了高校的绩效化办学思维,弱化了质量意识。因为科研产出的绩效相对于测评,所以科研量化评价长期被视为高校进行质量治理的主要内容。

科研量化评价与绩效化管理相互强化,导致科研成果数量激增而质量不足。在“科研至上”思维的支配下,高校的教学与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可见,绩效本身其实包含着对质量的要求,但绩效主义则淡化了质量要求,片面追求规模与速度。这是当前评价与治理模式下高等教育质量面临挑战的重要根源。

方向:高等教育评价须聚焦“高质量”

基于以上事实及反思,笔者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应进行若干向度调整。

首先是确立反映高等教育规律的评价观。高等教育评价必须聚焦“高质量”关键词,构建集中反映发展品质的评价体系,以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个性化评价引导高校创新办学,避免标准化、统一化评价模式限制特色、创新办学。

在这方面,应强化评价的服务性、发展性功能,充分发挥评价在一流学科建设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诊断、导向、指导作用。同时,应以促进师生共同成长为导向,走进基层,观照生产一线的真实需求。

第三,建立AI教育道德与监管框架。目前美国联邦已有法律强制平台下架不经同意的AI爆料和深度伪造内容,教育部也发布了针对学校AI使用的安全与合规工具包。此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起草法规,拟对深度伪造内容的制造与传播进行监管。

第四,推动“AI教育公平计划”,缩小资源鸿沟。AI教育政策将倾向性地支持农村、原住民、少数族裔等教育资源薄弱区域。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教育与教育部已达成协议,将优先在这些地区部署免费云服务与开源模型。

第五,构建“美国式AI文化认同”与全球战略输出。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的,梅拉尼娅在白宫会议上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奇迹时刻”。这不仅是一种感性表述,更是一种明确的国家定位。她将AI教育上升为国家使命,将技术与青少年未来深度绑定,试图在公众叙事中构建一种“美国主导AI时代”的文化想象。而《卫报》也敏锐地指出,特朗普政府推动“总统AI挑战赛”等举措,反映其借由教育系统、公共话语与科技资源,强化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中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些动向共同揭示AI教育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工程的构建路径,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战场。

技术治理试验正式开启

此次“白宫人工智能教育特别工作组会议”,标志着美国AI教育政策正式进入全面部署阶段。从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设立政策框架,到8月推出“总统AI挑战赛”,再到此次集结政府高层与硅谷科技公司的白宫会议,短短数月间,美国已完成了从政策顶层设计到社会各界动员的初步闭环。

我以为,会议的核心议题虽以“教育”命名,但实质上,其围绕AI技术在课堂中如何应用、谁来主导、如何监管、风险如何应对等问题的讨论,使得这次会议更像是一个技术治理机制的试验场。

可以预见,未来AI教育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文化与技术政策的重要象征之一。AI将不再只是高科技企业的产品,将渗透进每一个教室、每一次作业、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轨迹。而美国政府也试图借此打造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AI教育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话语权。

然而,政策落地仍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公平如何保障?师资培训能否及时跟进?学生数据的边界如何设定?在这些问题完全厘清之前,AI教育既是一次战略性机遇,也是一场制度性考验。

可以说,此次白宫会议打开的是一条通往未来教育的新通道,也开启了一场关于人、技术与教育治理的新辩论。这不仅关乎美国的下一代,也深刻影响全球AI时代的教育想象与制度构建。



李锋亮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近日,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在线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医生群体在使用人工智能一段时间后停止使用,会出现什么问题。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医生的判断更为准确,但一旦停用,准确率就会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长期使用人工智能会让医生独立诊断的能力发生退化。该文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地图导航效应”——如果有人长期使用交通导航系统,那么离开系统后自主认路的能力就会大幅下降。

那么,是否需要担忧上述结果,进而支持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以及研究生培养上的大规模应用?我认为,“地图导航效应”是正常的,此类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比如,有了火柴后,人类钻木取火的技术会退化,最终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一辈子根本用不上这项技能。这固然使得大多数人野外生存的能力下降,但也让更多人更加容易地利用火,让人有更多时间学习其他知识或者实现更多有价值的产出,毕竟钻木取火需要更多的时间。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地图导航效应”。交通导航系统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顺利通勤,促进了交流与往来。随着需求的增加,各类导航系统也不断升级,进而实现和社会需求的相互促进。如果社会突然从有导航转为无导航,那必然意味着一次严重的广泛性危机,而这并非普通人凭自身努力就能防御的。因此,即便依赖导航系统导致个人自主认路能力大幅下降,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现象。

不过,不必担心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能力退化,这并不是说要放任自己专业能力下降。对于研究生而言,当然应该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帮助自己阅读海量且艰深的专业文献,迅速掌握经典与前沿的研究方法,以及拓宽研究思路。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研究生可以迅速跨越科研的门槛,开启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

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阅读文献、掌握研究方法、拓宽研究思路,不是说自己不再主动完成这些工作。相反,研究生应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阅读更多的文献、掌握更多的研究方法、开拓更加广阔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像人们有了火柴那样,更加轻易地使用火,将钻木取火的时间用于学习更多的知识。

人类有了书籍之后,并不因为知识可以通过翻书本获得而减少看书时间,相反促进了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书。与此同时,也让先哲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同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应该促使更多学习者阅读原先门槛极高的文献。

试想,如果研究生利用人工智能帮助自己先大致了解某些艰深但重要文献的主体内容,再和人工智能一起反复深入探讨自己没有充分明白的细节,然后从头到尾、逐字逐句阅读完这些文献,最后做阅读笔记,这不但不会导致研究生文献阅读能力的下降,反而会提高其水平。与此同时,研究生抱着“尽信人工智能则不如无人工智能”的态度,在和人工智能互动情况下,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与批判性思维。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研究方法的掌握。研究生应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创新地使用研究方法,进而做出更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迅速成长为研究专家。

再回到开篇这项研究。如果长期使用人工智能会让医生诊断的能力下降,这意味着相关任务完全可以交由人工智能,就像点火交给火柴,而不必再依赖钻木取火。而医生应该通过人工智能提高自己诊断的准确率或者更好地判断病人其他相关的病情等,这样即使自己独立诊断的能力下降,但其他更为重要的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因此,现在的研究生在学习时,不必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自己某项研究能力下降,反而应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让自己的综合研究能力得到质的提升。也就是说,有了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研究生在学习与研究中可以“偷懒”,相反,他们更应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与科研,如此才能更快地实现从“新手上路”到“小试牛刀”,再到“专家学者”的跨越。

(作者系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不必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研究生能力退化

高教评价模式改革应进行向度调整

张继明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评价模式改革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相继出台了多个重要文件和举措。

可以说,当前我国已处于以全面评价牵引高等教育体系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评价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实践层面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亟须从问题出发,深化评价改革与创新,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困境:教学、科研失衡现象仍严重

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务,人才培养无疑是高校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相应地,高校教学评价中关于教学能力或质量的评价也应是相关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在现实中,此类工作评价形式化问题一直存在,表现在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取向的教学观、质量观流于表面,立德树人导向模糊,评价指标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核心能力,甚至用一些可视化、可测量的指标,取代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致使德行、责任与创新能力等核心要素难以进入评价体系。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评价上,依旧奉行知识本位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识别与评价机制。

与之相应的是,对教师教书育人真实效能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空缺状态。部分高校在淡化教学品质的同时,片面强调并不断强化学术评价。一方面,这种评价体系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对立,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高校教学质量缺陷的根源;另一方面,学术评价高度量化,“工分制”评价难以体现教师创新学术的内在动力,科研“短平快”倾向严重,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学术不端。

对于学科而言,作为高校办学的基本单位,当前的学科评估过于强调知识生产功能,导致学科内涵被窄化。知识生产又主要依赖于可量化、产出效率高的学术成果,这种以“批量制造”为特征的建设模式使学术质量陷入困境,并进一步引发生态失衡。部分热门学

科量化评价与绩效管理相互强化,导致科研成果数量激增而质量不足。在“科研至上”思维的支配下,高校的教学与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

科持续获得资源投入,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特色学科却明显投入不足,从而使得颠覆性理论与技术难以取得突破,学科结构呈现封闭、滞后、老化趋势,致使高校的特色办学与差异化发展理念难以真正落实。

同时,在质量、特色与贡献日益成为高校评价重要标准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价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质量评价上,依旧未摆脱以规模与速度代替质量的传统思维,标识质量与创新评价的指标十分匮乏。

在基于贡献的评价上,不仅指标设计明显缺失,而且在封闭化办学条件下,评价指标难以反映高等教育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方面的实际效能。

此外,高等教育评价往往片面强调管理而忽视服务。评价者主要以行政权力为驱动,以督导、考核为基础,以绩效与利益分配捆绑为手段,激励被评价者不断加大投入和提高效率,而对其资源短缺、结构失衡、制度缺陷及能力局限等问题则疏于指导。因此,高等教育评估常常采取“事后材料检查”的形式,深入院校生产一线的深度评估则较少或流于形式。这导致高校及院系疲于应付各类评估,陷入绩效竞争甚至无效内卷,而内涵式发展能力却没有改进。

反思:高等教育评价存在绩效主义

在由教育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建设过程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快提升教育质量,进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